

一、概念／觀念——抽象化的思維圖式／意識形態化的價值信仰

一般而言，命名開啟了物與類的關係化框架，及人概念化認知世界的可能：概念是對多種事物共相的一種抽象化的思維圖式；概念的變化和擴大，反映了對世界的知識和認識的轉變與拓展。概念作為社會經驗與世界認知的智性範疇，構造了生活世界，是社會意義的載體，承載了經驗事實與價值意義的關聯性。藉著經驗事實與價值關聯的沉積、附著，也漸而形構出理念型概念 (ideal-typical concepts)，並進而積澱、呈顯為一種意識形態化的觀念系統，支配著社會制度，指導著文化行動。

社會文化往往憑藉著一套價值意識形態化的觀念系統作為其正當性與合法性的根據與基礎，以維繫整體的常態性運作。意識形態化的觀念系統維繫著文化範式時期的價值信仰；文化範式發生移位時，原意識形態化的觀念系統勢必有所調整、變化、更替；從而發展出新的文化綱領與行動策略，調動起巨大的社會再動員、文化再認同的歷史能動力量與社會集體的情感凝聚作用，而有進一步文化再造的契機與轉機。亦即，在需要一種新的闡釋以置換價值代碼並取得意識形態合法化、正當化的當下，凝聚集體情感的認同機制一被啟動，必然帶來某種共同的文化行動。因而，社會文化的遞嬗變遷，實質是在一系列觀念與事件、行動複雜互動的歷史過程中，呈現為價值意識形態化觀念系統的解構、重構的文化再造歷程。然而，文化失範的革命時期，雖然某一思想體系解體了，但原範式時期組成價值意識形態化的基本觀念並不必然消失，組成思想體系要素的觀念仍以相對穩定的思想碎片¹的方式殘存著；基本觀念與觀念之間在變化、重組，甚或互植、錯生的同時，往往重新構連、綴合著文化母體中重要的思想碎片甚或其他者文化的思想斷片，從而構築出一套符合新價值意識形態化的觀念系統，以作為發展新文化綱領與行動策略的重要歷史能動力量，藉以召喚、凝聚集體的情感認同。

因而，或可說概念是抽象化表述事物特性和關係，織構出各種「意義」網絡的一種觀看、理解世界的思維圖式；觀念則構成了自我意識與社會價值，是一種作為可溝通性與可分享性的公共思想與信仰，而指向於一種與事件、行動緊密關聯、彼此作用的社會巨大能動的心理

1 誠如金觀濤與劉青峰所言：「意識形態作為社會制度正當性基礎以及指導社會行動的綱領，是建立在一組普遍觀念之上的」。因而，「要理解革命意識形態解體後的思想形態，最可行的方法是考察那些組成思想體系的基本要素，即那些經歷了一次又一次意識形態建構和解構、仍然存在而且相對穩定的思想碎片」。金觀濤、劉青峰：《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頁2。

系統與意識形態化的價值信仰²。觀念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化的價值信仰，維持著社會關係形式的穩態性、存續性的發展，是社會得以正當性與合法性運轉的一種價值認同與實踐法則。

二、概念／語境／事件——觀念史研究的進程

觀念史 (History of Ideas) 概念雖源於法國啟蒙運動，但遲至 1922 年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成立觀念史學社，始揭示出觀念史研究的宗旨³。其中真正奠基的是諾夫喬伊 (Arthur O. Lovejoy, 1873-1962) 在 1938 年創建《觀念史雜誌》(*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進而使觀念史研究在美國形成一個完整的學科。Lovejoy 認為觀念是在認識世界的長期過程中形成的，觀念構成思想的基本要素；各種思想可分解為諸多單位觀念 (uni-ideas) 與觀念叢 (idea-complexes)，每一種觀念是由各種相互關聯的單元觀念組成，而單元觀念也是許多觀念的複合物。Lovejoy 研究諸觀念的複合物的歷史，注重觀念的歷史起源、演變，及其作用與影響；觀念得以產生、變化、影響的心理學特徵；觀念群的發生與發展過程及其賴以產生的原則之間的聯繫。此外，也關注語詞在思想運動中真正起作用的因素，在判定語詞背後潛藏的觀念時，除須注意從一個意義向另一種意義轉移的語義學過程外，也須關注於思想史與趣味史中術語意義上的變換和含混的作用。甚而，觀念也演繹出認識規範和倫理規範的實踐史⁴。

然而，由於 Lovejoy 著重於尋找某種觀念的基本意涵的不變性與必然存在性⁵，故劍橋學派的政治哲學家斯金納 (Quentin Skinner, 1940-) 與朴考克 (J.G.A. Pocock, 1924-) 即針對 Lovejoy 觀念史方法的缺點予以修正。劍橋學派政治思想的歷史研究最大特點是將思想史研究進行語言轉向，形成以話語為主的觀念史研究。Pocock 作為一種新型歷史方法的先驅，在六〇年代和七〇年代初期，即強調文本含義來自於所屬價值體系與換與環境，群體決定個人的表述可能性。因而，主張語境說，關注陳述的語匯系統、結構或規則，及以言行效的語言使用之層面。Skinner 則關注意圖與言說效應的關係，主張應當首先揭示重要言說的意涵和主題，及其與言說的論爭語境的聯繫或關聯。由於言語行動深嵌於文本空間中，文本空間中承載著巨大言說主體的行動意圖，而言說主體的行動意圖可以從通過理解其行動本身的習傳意義 (conventional significance) 與話語機制 (discursive regimes) 中把握，故從語境還原行動主體於言說 (saying) 過程中的行為 (doing)，從而依照所用術語的本義和所指，理解言說主體的言說意圖，則能有效考掘言說者的意圖與言說效應間的關聯，並掌握語言與意識

2 參鄭文惠：《東亞觀念史集刊》第 1 期 (2011 年 12 月)，〈發刊詞〉，頁 XII-XIII、鄭文惠：〈觀念史研究的文化視域〉，《史學月刊》，2012 年第 9 期，頁 15。

3 1922 年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成立觀念史學社，進行「一般哲學概念、倫理概念和美學風尚，還有文學發展和影響的歷史研究，以及揭示哲學史、科學史和政治、社會運動史的相互聯系的觀念和思潮的研究」。洛夫喬伊著，吳相譯：《觀念史論文集》(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 年)，〈引言〉，頁 2。

4 參諾夫喬伊著，張傳有、高秉江譯：《存在巨鏈：對一個觀念的歷史的研究》(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 年第 1 版)、洛夫喬伊著，吳相譯：《觀念史論文集》(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 年) 二書。

5 昆廷·斯金納著，任軍鋒譯：〈觀念史中的意涵與理解〉，《思想史研究》第一輯 (2006 年 7 月)，頁 129-30。

形態變遷的關聯。⁶正因 Skinner 將政治思想現象視為一種語境、言說者、言說行為、言說意圖的互動過程，因而，Skinner 言說考古學的觀念史研究，著重建構行動者意識形態的歷史脈絡以及行動者在此脈絡間不同層次的意圖。尤其政治思想中重要詞彙的語意轉變，往往承載了具有一定社會意涵的概念的轉變，象徵著集體對某些社會價值產生了認知上的改變。⁷因而，Skinner 認為只有不同觀念運用以及運用這些觀念時的不同意圖的歷史，⁸而逆轉了 Lovejoy 認為觀念的基本意涵的不變性與必然存在性。

至於，德國概念史學派，則奠基於史學家科塞雷克 (Reinhart Koselleck, 1923-2006) 在 1955 年創辦的跨學科、跨文化、跨國界、跨時間之關乎語言含義與嬗變研究之《概念史文庫》(Archiv für Begriffsgeschichte)、《哲學歷史詞典》(1971-2007) 以及《歷史中的基本概念——德國政治和社會語言歷史辭典》(1972-97)⁹，與哲學家里特爾 (Joachim Ritter) 在《概念史文庫》基礎上主編之十三卷《哲學歷史詞典》(Historisches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 (1971-2007)。Koselleck 概念史研究主張社會變遷在政治與社會的「主導概念」或「基本概念」中留下語義的印記，因而，關注在社會結構中語義生成的歷史。正因，「歷史沉澱於特定概念」¹⁰中，故而透過社會和政治「主導概念」或「基本概念」在不同歷史語境中的語義生成條件、媒介和手段、內涵、演變及作用、影響，以研究概念的話語行為歷史，則在語義的擴展、縮斂、移位的變易中，當可描述和勾勒出概念的常態、斷裂及其變化，以揭示歷史變遷的特徵。亦即概念史通過考察語境，挖掘概念的語義結構，來確認「特定概念的建構能量」，且更多地關注「政治和社會事實與其語言兌現之間複雜的互動關係」¹¹。Koselleck 概念史研究是一種概念變遷的歷史宏觀考察，不同於 Skinner 集中探討較短時段中概念的含義變化。

轉型期／概念／術語／語境是 Koselleck 概念史的主要方法框架。Koselleck 概念史研究之獨特處，正在於將表達概念的特定語彙——「術語」與語境作聯繫，從而揭示概念如何在社會行動的衝擊中形成與流變；正是在術語／概念的變遷上，發現了整個社會現代轉型的

6 參昆廷·斯金納著，任軍鋒譯：〈觀念史中的意涵與理解〉，《思想史研究》第一輯（2006年7月），頁132、141、159、162。

7 梁裕康：〈語言、歷史、哲學——Quentin Skinner 論之政治思想方法論〉，《政治科學論叢》第28期（2006年6月），頁116。

8 昆廷·斯金納著，任軍鋒譯：〈言語行動的詮釋與理解〉，《思想史研究》第一輯（2006年7月），頁141、142；梁裕康：〈語言、歷史、哲學——Quentin Skinner 論之政治思想方法論〉，《政治科學論叢》第28期（2006年6月），頁116。

9 《歷史中的基本概念——德國政治和社會語言歷史辭典》通過一百多個概念（詞彙）的起源、定型和變遷的歷史語義學的考察中，揭示德國現代思想觀念的形成，及其形成背後所牽涉的整個德意志民族形成的近現代史。

10 方維規：〈歷史沉澱於特定概念〉，《二十一世紀》總第111期（2009年2月），頁124-31。

11 參 Reinhart Koselleck, "A Response to Comments on the Geschichtliche." In Hartmut Lehmann and Melvin Richter, eds. *The Meaning of Historical Terms and Concepts: New Studies on Begriffsgeschicht*.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 1996、方維規：〈歷史語義學與概念史——關於定義和方法以及相關問題的若干思考〉，收入馮天瑜編：《語義的文化變遷》（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12、14、16、19。方維規：〈「鞍型期」與概念史——兼論東亞轉型期概念研究〉，《東亞觀念史集刊》第1期（2011年12月），頁99。

歷史。因而，關注於「術語」如何在「轉型期」的「語境」中不斷變化的語義，以挖掘概念的語義結構，這是一種對轉型期影響民眾的社會和政治「主導概念」或「基本概念」作歷史語義學的概念變遷的宏觀考察。

另如 1958 年雷蒙·威廉士 (Raymond Williams, 1921-88)《文化與社會 1780-1950》(*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 一書，分析英國在 1780-1950 年間文化與社會的變化，並附上 60 個詞彙的分析作為附錄。八〇年代則將原附錄詞彙獨立且擴大為 130 多條辭彙研究，輯為《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彙》一書。Williams 通過考察「工業」(industry)、「民主」(democracy)、「階級」(class)、「藝術」(art) 和「文化」(culture) 等關鍵詞意義轉變的歷史，分析英國在 1780-1950 年間有關政治、經濟、社會的重大發展與轉折，勾勒出英國現代文化及整體的生活方式 (the whole way of life) 的重大變遷。Williams 將與社會文化整體變遷「重要且相關」及「意味深長且具指示性」的詞命名為「關鍵詞」，著重探討「關鍵詞」在語言演變過程中詞義的變化，以及彼此間相關性與互動性的相互影響與語言演變過程中意義的變異性與複雜性。¹²

無論是 Koselleck 研究德國概念史，或是 Williams 研究英國文化變遷，都是通過術語／關鍵詞的意義變化，揭示社會轉型期文化、觀念的演變過程，方法上都是將詞彙的歷史語義學考察和概念／社會變遷研究建立起聯繫，而呈現為一門兼涵歷史和語言學的新學科。

由於觀念往往憑藉著語言文字而得以成為一種具可溝通性與可分享性的公共思想與價值信仰，尤其是在社會文化轉型期中，觀念的變化愈形劇烈的當下，觀念更須依賴文化母體中重要的文化原料及文化交涉中引進、傳佈而有所轉化、形塑的概念與他者文化相互調停、協商，其中「關鍵詞」實質上扮演著極為重要的功能與作用。大抵而言，在充滿裂縫的意識形態化觀念系統中，觀念與觀念之間總是不斷碰撞、混雜、悖反著，而呈顯為一種相互交織、涵攝；彼此嫁接、抗拒的複雜互動過程而積澱於歷史；社會、歷史變遷過程中，往往呈現為一種改變、翻轉舊語詞，及創造新語彙以表達對現實關係新的認知的語言演變過程，而社會轉型期語言演變過程中意義的變異性所涉及及思想觀念、價值信仰衝突、轉變的樣態，也往往凝塑為「關鍵詞」。正因每個關鍵詞背後都涵藏著當時共同體的世界觀邏輯，透過關鍵詞的歷史語義學的考掘，當可描摹出當時的社會意識與歷史變遷。因而，或可說歷史、濃縮於「關鍵詞」，¹³「關鍵詞」是反映歷史與現實關係的一種新現實文本；「關鍵詞」意義轉變的歷史，不啻是一部社會文化變遷史。

12 參 Raymond Williams：〈導論〉，見 Raymond Williams 著，劉建基譯：《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匯》（北京：三聯書店，2005 年），頁 7、15、16。

13 金觀濤、劉青峰把柯林武德 (R.G. Collingwood)「歷史知識濃縮 (incapsulated) 於思想結構」及「歷史沉積於特定概念」之說轉化為「歷史知識包含在某些關鍵詞意義形成之中」，見金觀濤、劉青峰：〈隱藏在關鍵詞中的歷史世界〉，《東亞觀念史集刊》第 1 期（2011 年 12 月），頁 80。柯林武德「歷史知識濃縮 (incapsulated) 於思想結構」之說，見柯林武德著，何兆武、張文傑譯：《歷史的觀念》，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年，頁 21-22。

三、文本互文性／觀念再現——跨領域的文化考掘學

再者，觀念史研究，又是一門跨文類、跨學科、跨領域¹⁴的文化考掘學，提供了越界研究的可能方案與基本圖式。

概念／觀念以其獨具的抽象性，往往須憑藉文學、圖像、影像、儀式、詞彙等形象隱喻而具形。無論菁英或常民的世界觀都是由諸多概念／觀念組構而成，而概念／觀念寓棲於文學、圖像、影像、儀式、詞彙的文化再現空間中；文學、圖像、影像、儀式、詞彙，作為觀念再現的重要美學載體，無疑成為文化內部結構及文化重組和轉化之際的重要組成部份；各類形象修辭與文化符碼，構築出一門複雜的文化象徵學，屢屢在歷史行動或文化事件，乃至於跨文化交涉中，扮演著重要而具意指性的關鍵性環節。因而，認知觀念與社會、事件的互動，尤須透過以觀念為核心的跨領域、跨學科、跨文類的越界研究與互文性的脈絡化分析，方能掌握觀念的流通、反芻、轉化的社會化過程與文化交涉中，如何以一種文學、圖像、影像、儀式、詞彙等美學修辭作為多重中介，進行複雜而動態的隱喻與象徵，以作為凝聚情感，引領行動的概念工具與思想資源。因而，詞彙的歷史語義學分析或文學、圖像、影像、儀式等形象修辭與概念隱喻的文化考掘學和概念傳播、觀念變遷研究，宜緊密建立起聯繫。

詞彙、圖像、影像、儀式等形象修辭，作為一種觀念再現的美學載體，向來包孕著複雜而隱微的隱喻與象徵；觀念與詞彙、圖像、影像、儀式所建立的多層次隱喻與象徵關係，尤須藉由一套形象美學修辭建立彼此的依存關係與轉喻機制；一個個概念／觀念，往往藉由相關形象、情節之文化敘事，進而使概念／觀念轉換為社會行動，演繹為文化事件。

如未有文字之初，原始初民在群山縱險崎曲猛獸出沒之處，往往畫上猛獸之圖像；原始岩畫上的猛獸圖無疑是作為一個「危險示警」的概念，以提示圖騰氏族戒惕慎防之警戒之意。此外，人面岩畫更是祖先文化崇拜的圖騰物，是原始初民祖先崇拜觀念系統的美學載體。人面岩畫作為一個文化象徵符碼，實質表徵著圖騰氏族透過祭典儀式、歌舞飲宴、娛神媚神而達致情感認同的一種觀念再現。又如「正」樂與「淫」曲、「正」色與「雜」采等音樂與色彩之用語，在傳統世代即蘊含著意味深長的政治隱喻：「正」樂、「正」色，承載了「中正」、「中和」之美的「治世」的文化象徵；相對而言，「淫」曲與「雜」采，則為「亂世」的文化表徵，是傳統中國君王政權歷史下的一門政治隱喻學，音樂與顏色作為治世與亂世的隱喻，成了儒家政治文化集體共有的象徵符號，一門門透過連類譬喻的修辭策略所構建的音樂／顏色政治學使概念價值化，從而更積澱為一種意識形態化的觀念系統。

再者，文學／圖像在表徵事件、再現觀念的抒情／敘事修辭策略中，往往通過一系列的意象／情節，構造事件與觀念、集體主體與社會現實的關係；文學／圖像文本空間中抒情／

14 觀念史研究之初，已然指向一條跨領域的研究路徑。勒夫喬伊（Arthur O. Lovejoy）曾言：學者各自在他們的秘室裡彼此孤立地極其仔細地研究已然被裂隔為文學、藝術、科學、神學、教育、社會思想等學科，致使原共屬於西方思想體系的有機體，被強行分割、肢解而無復生命，故而，倡言唯有「觀念史」才能使之起死為生。參勒夫喬伊（Arthur O. Lovejoy, 1873-1962）著，張傳有、高秉江譯：《存在巨鏈：對一個觀念的歷史研究》（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版）。

敘事的話語，實質承載著事件與觀念、集體主體與社會現實的構建關係。

如漢代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依倫常等級建立家國同構的大一統王朝。漢王朝選擇儒家作為社會正當性的基礎，在依差等倫理所建立家國同構的道德共同體中，家作為倫常等級關係之「實然」，為上層皇權提供合理性的統治依據；文士與庶民在家國同構的道德共同體中，服膺並遵從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應然」的反饋機制。道德實踐本屬「應然」領域，但漢代由天到人的道德推理模式，實質混淆了「應然」領域與「實然」領域，「天人合一」和「道德價值一元論」所導致「應然」領域的無限擴張，使得儒家意識形態具有抗拒證偽的機制。¹⁵因而，面對社會結構性危機時，往往被誤識為偏離德治之道，反而更加置固化對儒家意識形態的信仰，而促成道德意識形態認同的強化。東漢祭祀——死亡空間中大量的歷史故事畫像，及修身養德、懷榮名等純化道德意志的文學書寫，實質上或可視為是道德意識形態認同的一種文化敘事。東漢歷史故事畫像所再現忠孝節義的禮教圖式，或也可視為是符合三綱五常之具倫理道德範式的一種文化想像；歷史故事的圖像演繹與歷史形象的文化再製，實質表徵了宗法共同體的一種集體性的文化敘事，其中承載了想像共同體的意識形態與文化構念。¹⁶在家／宗族／國宗法一體化的體系中，家／宗族／國反饋模擬的運作機制，忠孝節義故事之具三綱五常的道德圖像，無非是在天人合一思維圖式下，實踐家國同構關係，維繫道德共同體的重要文化想像媒介。忠孝節義歷史故事是家國共構道德體中符應三綱五常的模範群，在規範化的「應然」的道德倫理空間中，透過家——宗族——國的反饋模擬運作機制，使人在道德意識形態認同中，找到道德的定位與情感的認同。¹⁷則東漢大量的歷史故事畫像，及修身養德的文學書寫，不啻為傳統宗法一體化結構下的集體共感與道德意識形態認同的觀念再現。

然而，東漢末期災異頻繁、瘟疫橫溢，復以皇帝專制、外戚宦官干政、黨錮之禍、吏治腐敗、土地兼併等宗法一體化結構異化，社會總體危機瀕臨毀滅性崩潰之際，價值逆反成為回應「哀時命」的另一種心理機制。生死大限、時俗溷濁，君臣相失、世亂流離等社會現實與文化世變——被編碼，構築為東漢文學／圖像「哀時命」的時空場域，無論是寓言敘事如〈枯魚過河泣〉、〈烏生八九子〉，或現實控訴如〈孤兒行〉、〈婦病行〉等詩，均流露出集體共感的「遭命」¹⁸的時命之悲。至於道德意識形態的全盤性價值逆反¹⁹更呈顯為一種「以無為

15 參金觀濤、劉青峰：《中國現代思想的起源——超穩定結構與中國政治文化的演變（第一卷）》（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1版），頁40。

16 參鄭文惠：《文學與圖像的文化美學——想像共同體的樂園論述》（臺北：里仁出版社，2005年初版），頁66、143。

17 參鄭文惠：〈禮教圖式與死亡信仰——東漢武氏祠歷史故事畫像之文化敘事新論〉，《勵耘學刊》，文學卷，2010年第1輯，總第11輯（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6月）一文，及《文學與圖像的文化美學——想像共同體的樂園論述》（臺北：里仁書局，2005年初版）一書。

18 「命」為漢代哲學重要的論題，當時「三命說」中，「遭命」之說是一種「哀時命」的集體共感，屢屢呈現在文學書寫中。有關「三命說」，見王充《論衡·命義篇》：「傳曰：『說命有三：一曰正命，二曰隨命，三曰遭命』。正命，謂本稟之自得吉也。性然骨善，故不假操行以求福而吉自至，故曰正命。隨命者，戮力操行而吉福至，縱情施欲而凶禍到，故曰隨命。遭命者，行善得惡，非所冀望，逢遭於外，而得凶禍，故曰遭命」。王充著，北京大學歷史系《論衡》注釋小組注釋：《論衡注釋》（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第1版），〈命義篇〉，頁80。

19 金觀濤、劉青峰云：「由於是外部目標不可實現而導致人們放棄原有道德理想，人們極可能在放棄具體外部規範的同時，對追求任何外在社會目標都表示失望，把道德追求落實到純個人行為或逃避此世的方

有」的思想樣態，道家「自然無為」成為破除、取代儒家道德規範的一種新道德、新價值。因而，表現於文學／圖像文本空間中，多呈現為或求仙永生，或隱逸求道，或自然無為，或及時行樂，以回應時命不逢之境及消解時命不逢之悲。²⁰則知東漢文學／圖像中與「哀時命」主題相關的文化敘事，毋寧是文士與庶民對社會現實與文化世變及自我境遇的一種修辭再現。文學／圖像的形象修辭與概念隱喻，作為一種觀念再現的美學載體，東漢歷史故事畫像、永生仙境圖式及隱逸求道、享樂主義的興起，無疑是各自表述著強化三綱五常道德意識形態認同及道德意識形態全盤性價值逆反的不同觀念的移位。

又如中國傳統經典性的桃花源文本作為自由生命與理想邦國的一種隱喻與象徵，經由累代文學藝術家不斷擬形賦意，而拓植、深化了桃花源文化美學的意涵。歷代文人面對政治變局、社會離亂、人性崩解等總體異化，多透過桃花源的意指實踐歷程，將異化的世界轉變為一窺視的客體，藉由文化生產的意指過程，建制出理想的生命圖式與社會圖式，用以彰顯自我主體與文化認同，並抗衡政治宰制與社會壓迫。因而，「桃花源」不僅是文人精神家園終極原型的示現，也是「應然世界」典型的「文化圖像」；「桃花源」作為生命回歸的「精神家園」與「理想邦國」²¹「應該如何發生」的一種歷史假設，是一個兼具生命追尋與文化認同的象徵符碼。累代恆久不輟的樂園想像與桃源圖式的文化建制，實質涉及不同世代、不同的人對理想化之「應然生命」與「應然世界」的追尋與建構，既是人內在本性的基本欲求，也同時是觀看世界、面向現實轉而逆轉現實、超離世俗的一種特殊美學視域；桃花源意象／情節的隱喻修辭結構與桃花源地理學知識系譜的文化建制，承載了異化世界中人對「應然生命」與「應然世界」的理想投射與觀念再造。如元代在文化世變的歷史現實中，桃花源往往被轉喻為太平／非戰的空間，也是遺民不忘故國的隱遯空間。桃花源仿如神話樂園世界，是元代文人社群冀望回歸文化本根的隱喻，同時也兼涵作為抗斥政治實體空間位址的一種象徵符碼。至於桃花源文本結構或指向於全真教式之仙隱及家鄉化之漁隱型態，乃至於作為情色歡娛而失落的指涉空間，不免成了元代文人社群去政治、超政治的隱逸情懷及面向現實困境而尋求生命超越的一種隱喻。晚清時期隨著地理大發現、新知新學的產製及烏托邦的譯介，知識菁英面對西方文化霸權的無限擴張及變動劇烈的政治時局，往往挪移古典桃花源文本，並嫁接、編譯、轉化、改寫華胥國、黃金世界、極樂世界、大同、仙鄉等神話樂園文化譜系與西方烏托邦的文化語境，而再現出新的桃花源／烏托邦的敘事結構，桃花源／烏托邦的追尋與建構，成為晚清知識菁英面向現實社會與政治時局的一種批判視角與隱喻象徵。在對顯、批判現實的混亂無序與匱缺破敗的同時，又往外求索，迎向未來，主動介入桃花源／烏托邦之他者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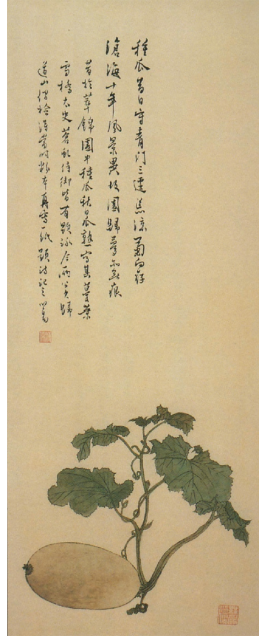
向上，這時善這一價值同行為規範之間就出現了結構性斷裂。我們將其稱為全盤性價值逆反。全盤性價值逆反除了把取消一切規範作為新道德價值外，還否定人積極人世地去實現外部目標，以無為作為最高道德。針對原來道德的強制性，全盤性逆反還把反強制本身也變成道德原則，這就是對『自然』的偏好」。金觀濤、劉青峰：《中國現代思想的起源——超穩定結構與中國政治文化的演變（第一卷）》（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1版），頁47。

20 參鄭文惠：〈集體共感與生命悲歌——漢代文學／圖像「哀時命」的文化敘事〉，臺灣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主辦：第七屆漢代文學與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2009年10月）一文。

21 何冠驥：〈《桃源夢》與《遠方有個女兒國》——當代中國反烏托邦文學的兩個路向〉，《中外文學》，19卷5期（1990年10月），頁28-29。



圖一 錢選「秋瓜圖」



圖二 溥心畬「瓜圖」

間中，並以新知新學新科技興邦建國，進而塑造現代化國家，使社會走向新文明境界；晚清桃花源／烏托邦的敘事結構，實質富涵著主體改造與拯救靈魂，及興利除弊與救國興民之啟蒙與革命的價值底蘊。則晚清桃花源／烏托邦之樂園敘事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化的文化文本，無疑既是一種社會矛盾與政治危機的象徵性再現，也是一種尋求社會變革與改造國家的欲望投射與表徵形式。至於臺灣 1986 年賴聲川執導的《暗戀桃花源》，毋寧藉由《桃花源》與《暗戀》兩齣舞臺劇的後現代拼貼方式，同臺共同演繹出後設的桃花源傳統經典符碼與老

兵渡海來臺的現實話語，樂園的文化記憶與現實的離散經驗，透過彼此指涉、對話、消解之符號共謀關係與修辭解構策略，既揭露了身分建構與文化認同存在著歷史斷裂性，也象徵著四九年兩岸分治的政治現實與解嚴後臺灣追求主體認同的歷程。則中國歷代桃花源話語體式的建構與接受，毋寧是立基在傳統文化層積與文化變異下所再現的一種新的文化想像，而呈現為新的價值意識形態化的轉義結構。一個新的歷史文化語境，往往有著不同的敘事／抒情範式，是共同體意識形態的象徵性再現。正因桃花源是中國文人對理想生命與理想邦國價值外化的一種象徵與隱喻，因而，桃花源的接受史始終涵具了一種生成性、建構性的話語形構力量。²²

又如「瓜」作為一個文化象徵的美學符碼，《詩經·大雅·綿》提供了「綿綿瓜瓞」的原型意象，隱喻周太王王業根基之奠定，世世代代廣續而不絕；在宗法社會中世俗常民以之作為傳宗接代，子孫繁衍、世代綿延的吉祥寓意，而涵具了生命繁盛、代代傳衍的文化隱喻。遭逢世變的遺民如宋末元初錢選作「秋瓜圖」（圖一）或清末民初溥心畬作「瓜圖」（圖二）等，乃挪借《詩經》綿綿瓜瓞之形象並疊陳了東陵侯召平亡國隱逸的文化故事，以「東陵瓜」作為不認同新政權之反同化的文化訴求；錢選、溥心畬作為世變下的遺民主體，以記憶召回的回憶之姿，挪用東陵瓜的文化事典，使現在／過去得以迴映互涉；東陵瓜，無疑是

22 參鄭文惠：《文學與圖像的文化美學——想像共同體的樂園論述》（臺北：里仁書局，2005年初版），頁182-96、鄭文惠：〈樂園想像與文化認同——桃花源及其接受史〉，收入成功大學中文系主編：《魏晉南北朝文學與思想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里仁書局，2010年初版），頁147-82。另，有關晚清新小說的「烏托邦」視野，可參見清顏健富：《編譯／變異：晚清新小說的「烏托邦」視野》（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2008年7月）。

錢選、溥心畬生命存有的轉喻性符號，是身為遺民主體表述文化鄉愁的象徵代碼。然而，追憶的過程，書寫的當下，也使得記憶在話語實踐的書寫行動中不斷的復現，既得以抗禦被現實世界異化的可能，也填補遺民主體生命存有虛空化的匱缺，而進一步賡續、懸延了文化歷史的時間存在性；隨著記憶與回憶的文化召喚過程，進而也促成當下有新的建構的可能。話語形構作為一種美學修辭行為，開顯出一個遺民時空錯置的文化框架，在遺民時空場域中，錯置、構連出傳統文化的記憶空間，不免傳述出遺民作為欲望主體的永恆性的文化鄉愁，卻也同時表述為一種超離於現實社會的文化建制行動，則知「東陵瓜」不啻是遺民不認同新政權的轉喻符碼，更是反同化文化訴求的一種觀念再現。²³

由於「瓜」的形象，作為一種生命綿延傳承的文化隱喻，早已成為士夫與常民內置的感覺結構。近代中國因著西方文化擴張主義下帝國霸權的侵凌，「瓜」的形象圖式與政治隱喻，又再演繹為「瓜分圖」，但它依然疊置並傳衍了國家與宗族生滅存亡的文化隱喻，是家國淪亡的一種觀念化的視覺再現。如香港 1899 年 7 月 19 日謝纘泰（1872-1937）將所理解中國與列強的關係，繪為《時局全圖》（*The Situation in the Far East*）（圖三），在以熊（俄國）、鬥牛犬（英國）、青蛙（法國）、老鷹（美國）、蛇（德國）等動物象徵列強諸國，各自控制部分中國領土的政治諷刺畫中，傳遞了中國與列強間主動權與權力不對等的政治現狀。²⁴圖左上角詩云：「沉沉酣睡我中華，那知愛國即愛家。國民知醒宜先醒，莫待土分裂似瓜」。即是在家國同構道德共同體的文化框架下，挪轉傳統「瓜」形象的內置感覺結構為帝國強權瓜分中國國土的隱喻；分裂的「瓜」，已然變轉為近代中國國族在列強蠶食鯨吞下生命存有的轉喻性符碼；「瓜」作為一種觀念化的視覺再現，與晚清時局、西方霸權構連為一個國族存亡的文化隱喻。由「睡」而「醒」，雖挪用屈原「眾人皆醉我獨醒」的文化事典，但置放於帝國強權瓜分中國國土的晚清時局中，由「睡」而「醒」的情態與「瓜」的形象，共構為一組連類譬喻的隱喻關係，調動起傳統以來世代傳衍、反同化的內置感覺結構，成為「國民」「愛國即愛家」的集體認同，從而激揚民族情緒以救國的文化號召行動。因而，「瓜」作為形象隱喻與視覺再現的美學修辭策略，在近代中國是與國族存亡與權力不對等觀念共構為一個整體而不能分割的隱喻關係與象徵維度。文學／圖像等形象修辭，作為一種觀念再現的美學載體，往往藉由一套形象美學修辭與情節敘事結構建立彼此的依存關係與轉喻機制；觀念與文學／圖像所建立的多層次隱喻關係，關乎彼此之間轉喻的邏輯力度、情感張力；為



圖三 謝纘泰《時局全圖》
 (Tse Tsan-tai, *The Situation in the Far East*, 香港：不着出版地，1899年7月)

23 參鄭文惠：〈遺民的生命圖像與文化鄉愁——錢選詩／畫互文修辭的時空結構與對話主題〉，《政大中文學報》第6期（2006年12月）一文。

24 參魯道夫 G. 瓦格納 (Rudolf G. Wagner) 著，吳億偉譯：〈中國的「睡」與「醒」：不對等的概念化與應付手段之研究〉，《東亞觀念史集刊》第1期（2011年12月），頁14-39。

了召喚集體記憶與凝聚共體情感，文學／圖像作為觀念再現，大多從具寓意性的文化知識倉庫裡，採擷已然意識形態化的觀念或內置為感覺結構的文化原料，因應著不同的文化脈絡，再造新的文化隱喻工程，以調動起社會行動與文化再造的巨大心理動能。²⁵由傳統至近代中國「瓜」的形象與隱喻，儼然成了一門視覺政治學。

因之，觀念史研究，作為一門跨領域、跨學科、跨文類的文化考掘學，透過不同文類、不同領域之互文性分析觀念的文化再現，不啻開顯出一條跨界研究的觀念史方法與路徑。

四、中國／東亞／全球——自我與他者觀念域的文化交涉

近代漢字文化圈由於西學東漸，引進、傳佈相當繁富多樣的西方物質文明與知識概念，從而揭開了近代中國漢語新語的生成及容受西方文明與新知識、新概念的歷史。因而，要勾勒近代中國知識／概念的形塑與變遷等關乎觀念的轉型過程與思想樣態，無疑須在中國／東亞／全球的文化視域中，關注於自我與他者觀念域的文化交涉，而不能自外於他者與全球化脈絡的文化框架。

一般而言，空間是體驗現實、觀看世界的基本形式與主要框架，既為人建構自我主體提供了一種思維格局，也是自我主體感應於他者與回應於世界的重要架構。要研究「中國」，自不能忽略「東亞」命題。所謂「東亞」，既是一個地理的詞彙，同時也是一個虛假的詞彙，一個政治的詞彙，²⁷是一個不斷被想像和建構的概念。

一者，東亞作為一種空間性存在的符碼，涵具了一定歷史的、國家的、民族的、地域的實體性。除表顯出東亞各話語主體心理構型、思維方式及觀念凝塑的過程；各話語主體在不同時空脈絡下製造地理、譯介文化所生產出的東亞性，也不斷形塑著東亞集體共在的思想觀念。因此，東亞作為一種表徵的心象空間，既是現實經驗與社會轉變的產物，也是話語主體行動與意向的中心，是一個融入文化意識與現實經驗的意向性結構空間，它被各話語主體不斷符碼化而成為有意義指涉的空間，而表顯為一個涵具價值意識形態化的空間範型。東亞作為各話語主體的關照場域，一個意識關涉之地，一個前近代歷史世界的總體縮影，又歷經類同的文化薰染與篩濾，而創造出東亞歷史的獨自結構與歷史法則，漸而積澱為一個複雜的象徵體系，也因而東亞遂能以一個文化地理空間範型而涵蘊著意義與經驗。

25 參鄭文惠：〈觀念史研究的文化視域〉，《史學月刊》，2012年第9期，頁17。

26 沈國威通過漢字文化圈近代詞匯體系形成的視角，將中日詞匯之間的借貸關係，放在「近代」的歷史脈絡中，闡述對現代漢語近代新詞的產生與定型。見沈國威：《近代中日詞匯交流研究：漢字新詞的創制、容受與共用》（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1版）。又謂：「近代關鍵字作為詞彙體系的一員，一方面蘊含著譯詞創造、普及、定型的問題；另一方面作為近代觀念的承載者，又反映了東亞接受西方文明的進程」。沈國威：《中國文哲研究集刊》37期，〈《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書評〉，頁221。

27 據子安宣邦研究，「東亞」一詞作為一個文化概念最早出現在20世紀20年代的日本；到了30年代，它變成了一個具有強烈政治意涵的詞彙，為「大東亞共榮圈」的帝國主義戰略提供理據。見子安宣邦著，陳瑋芬譯：《東亞儒學：批判與方法》（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年初版），頁8-15。

28 西嶋定生認為皇帝制度、漢字、儒教與佛教等形成了也創造出東亞歷史的獨自結構與歷史法則。見西嶋定生：《中国古代国家と東アジア世界》（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頁51-92。

二者，東亞作為一個有意義區位的空間性存在，不同文化時空維度下，存在著空間之塑造、維繫和競逐關係。東亞作為一種空間性的社會實踐場域，是歷經不同歷史情境與時間脈絡下多重社會過程的建構物，是在特定歷史情境中特殊社會變動過程中不斷定義與正名的文化再造物，眾多社會空間在其中相互重疊、彼此滲透，而呈顯出鮮明的交混與協商的文化軌跡。尤其東亞作為跨國國際間的重要交匯點、必然的折衝處，是一個勢必捲入世界多重多樣力量交互作用下的權力競逐的產物。一組組文化操作生產著東亞的社會關係，東亞也被種種的社會關係所支持及生產，而恆常處於變動不居與文化再造的歷程中。隨著近代以降全球化多方話語權的交互競逐，東亞作為一個獨特的空間型態與區域概念，無疑呈顯為世界多重多樣力量交互作用下多元匯聚、輻湊出來的一幅幅多變而流動的歷史圖像。東亞作為東亞各國與全球權力關係的中介與體現，在歷史過程中不斷衍異出一場場權力的爭奪戲碼及文化建制的再造工程。無論是大眾媒介與國家權力及資本積累等抽象時空邏輯之上東亞社會關係的結構化，或東亞作為區域的空間形態，隨著歷史演變而不斷重構與轉化其空間意義與社會關係，無疑道盡全球化脈絡下多元且複雜的權力作用與相互影響²⁹。因而，或可說東亞概念述說了一則則內含眾多權力聲音與形式的文化故事，也呈顯為多重交錯的文化再造與歷史建構的敘事軌跡，使東亞作為一個區域的空間形態，佔據了一個獨特的生產與實踐的位置，同時也局部生產、建構了世界圖景。

然而，東亞作為一個概念，雖涵具一定歷史的、國家的、民族的、地域的實體性，在時間性的結構歷程中，東亞以其獨特的文化地理構型而呈顯為特殊的風土人文與類同的歷史經驗，同時又展現為或多向、重層而互為主體的文化共生又多元的面貌與內涵；東亞作為一個前近代以降開展而來的歷史世界，重要的行動、事件、制度、思想、觀念、信仰，經由跨文化、超國家的交流、傳播，早已錯綜複雜的呈顯為東亞各話語主體觀念價值的脈絡化轉換，而銘刻為一幀幀共織互構的東亞性之總體歷史圖像。若從區域史的觀點來看，東亞作為東亞各話語主體「共性」與「殊性」不斷交錯互動³⁰而呈顯為豐富而特殊的地域性經驗及全球各種力量匯聚、競逐的重要關係網絡，在東亞或全球的不對等關係結構中，又呈顯為一種跨文化、超國家的抽象時空邏輯之上的政治、社會、文化體³¹。因而，或可說東亞既是實體又非實體；是真實的地理，又是想像的地理；一方面看似存在著真實的政治、社會、文化體，但在多元文化主體與全球權力網絡的交流、互動、協商中，實質又盤根錯結為一政治、社會、文化的想像體。

因而，東亞作為一個區域的空間形態，是社會關係與文化秩序的體現。既有歷史、地理的寓意，也是社會與存有的真實。東亞以其獨特的文化地理空間構型與全球權力競逐關係而歷經不同而多元的賦義過程：東亞作為非處所非地方的空間性存在，既以獨特的文化地理空

29 參鄭文惠：《東亞觀念史集刊》第1期（2011年12月），〈從概念史到數位人文學：東亞觀念史研究的新視野與新方法〉，頁51-52。

30 參黃俊傑：〈作為區域史的東亞文化交流史——問題意識與研究主題〉，《臺大歷史學報》第43期（2009年6月），頁191。

31 參鄭文惠：《東亞觀念史集刊》第1期（2011年12月），〈從概念史到數位人文學：東亞觀念史研究的新視野與新方法〉，頁52。

間型態積澱著共同體的記憶再現與文化認同，體現為自我與他者共存共構的秩序與關係，而呈顯為一個相互映襯，彼此照顯的秩序脈絡與關係型態。但東亞概念在作為東亞各話語主體及全球多元權力衝突、競逐的戰場空間，又獨具他者性與排他性。因而，東亞是一個複數的概念，存在著事實概念與規範概念，乃至於是以一個既真實又虛構的異質空間（heterotopia）存在著，它是一個混雜、交匯的經驗空間，也是一個不同意識轉換的中介空間，是各種文化、權力穿越、構織而成的流動的疆界空間；它以一個異質空間的獨特性，非中心非邊緣的維繫著、翻轉著、顛覆著流動空間的社會關係與文化秩序。因而，或可說東亞作為一種概念方法、一種語言——³² 論述位址、一個異質空間，是真實空間的倒轉、對立、照見與再現，而與真實空間恆常處在一個鏡像關係中，如同鏡花水月一般——水中月，鏡中象，看似不可湊泊，無由分說，但明鏡之中，光映萬象，不與體離，不與影合，非一非異，總多為一，寓一於多，非離非合，不即不離，萬物萬象畢現其中。一切跨文化、超國家多音複調的交流與對話，及文化越界旅行與國家聯盟、文化認同、區域整合等脈絡化轉換，在其中不斷折衝、協商、對抗、凝塑，述說出東亞作為近代以來全球化脈絡下的重要區域空間型態與特定的文化地理空間範型如何翻造為一則則獨特而意味深長的文化傳奇。

尤其，「東亞」一詞在近代中國是作為在西方列強環伺之下與帝國主義³³ 相連結、相伴生的一個概念，一個與西方霸權有潛在共謀關係的帝國主義地理學概念。因而，研究近代中國觀念的轉型，宜將「東亞」作為一個概念與方法，除了耙梳近代中國觀念在東亞／全球視域下之意義建構歷程與脈絡化轉向外，「東亞」作為一種概念方法論或語言——論述位址，尤須重作反思並將「東亞」除魅化，以之作為「異質空間」位址，既再現真實空間，同時又是對抗性的空間配置，在抗拒性閱讀的基礎上，調動起話語論述的巨大能量。

不同語言之間在進行文化翻譯的過程中，本涉及跨文化流動中自我與他者觀念域的文化交涉。有關詞彙、概念的轉換與容受，牽涉到文化母體內語言原有意義的基本制約，但不同文化場域中總體複雜的情境，不免也使文化翻譯表現出某種偶然性與隨機性，而產生意義滑動、消解、更替的可能；當然，跨文化對話中涉及自我文化屬性與民族認同的重要概念／觀念，更常出現「不可譯性」³⁴。概念／觀念在不同語言的翻譯和傳播的「跨語際實踐」（translingual practice）³⁵ 過程中，在與他者異置而重新指認自我的同時，往往在文化母體的語料庫中擷取文化原料與思想資源，以一種心理防禦機制作為誤讀的根基，而不斷引起符號的移位，意義的滑動。因而，自我與他者觀念域的文化交涉，既是一個影響焦慮的文化誤讀

32 參子安宣邦著，陳瑋芬譯：《東亞儒學：批判與方法》（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年初版）、子安宣邦著，趙京華譯：《東亞論：日本現代思想批判》（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版）等書。

33 據子安宣邦研究，「東亞」一詞，在日本是伴隨著軍國主義的發展而來，涵具了帝國主義爭霸思維。參子安宣邦著，陳瑋芬譯：《東亞儒學：批判與方法》（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年初版）、子安宣邦著，趙京華譯：《東亞論：日本現代思想批判》（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版）等書。

34 方維規認為跨文化對話中常出現「不可譯性」，不同語言間缺乏相關對應詞，「更多的是緣於概念／觀念中特殊因素的增長。這種特殊性常被對話者當作認同形式，因為他們是以各自的文化屬性與所謂的不可譯性（民族特性）來界定自己的」。見方維規：《歷史語義學與概念史——關於定義和方法以及相關問題的若干思考》，收入馮天瑜編：《語義的文化變遷》（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16。

35 參劉禾著，宋偉傑等譯：《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中國，1900-1937）》（北京：三聯書店，2008年修訂譯本）一書。

過程，同時也是一種自我主體性的宣示，及一段製造話語權力的歷史。

如黃興濤認為戊戌時期康有為出於製造「變法」輿論的需要，在組織翻譯日文資料的過程中引入包括不少政法新名詞等近 400 個日本漢字名詞，與當時「改良」和「進化」、「進步」等帶有認識論傾向的新詞一併流通，無形之中也自然凸顯了改革、變法的合理性與合法性，而與進化論取向的價值觀的傳播相得益彰。³⁶ 近代中國新文化的開啟，一方面在跨文化交流中不斷積累他者的思想資源；一方面自我與他者也始終處於彼此爭奪話語權的競逐關係。康有為為了改革、變法，引進日本政法新名詞，並挪引西方進化論價值觀，作為變法的合理性與合法性的論據，無疑是在自我與他者觀念域的文化交涉中，藉由改革、變法，挪移他者文化以製造話語權力，以開顯改革、變法的主體性。又如其挪引西學進化之理，提出「尊碑」、「卑唐」之說，揭示書體、書風與時代風氣的深切關連。³⁷ 正因世變，康有為提倡碑學以開新變之局；「開新勝守舊」與進化觀成了「尊碑」、「卑唐」的理據，康有為暗用西方他者的進化觀念，製造了中國傳統帖學之外碑體書法典範之美的話語權力，然而，話語的深層意識仍是藉碑體魄力雄強、氣象渾穆³⁸ 等十美，隱喻改革、開新以救國的理念與主張，卻也促使書法美學範式產生移位。

又如「她」字作為關鍵詞研究，黃興濤提出「她」字的發明、論爭、早期傳播和最終流行，為中國近代的一個「文化史事件」。因為「它的誕生和流行，不僅是一種關係語法、詞彙的語言變革，也涉及社會性別意識問題，並成為新的現代性別觀念的重要載體」。此外，它還作為一個新的文學關鍵字，影響了現代中國文學新的主題書寫；它的傳播和早期社會化，不僅構成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有機組成部分，還曾激發國人對個人與國家關係乃至國家性質新的想像和認知，並在普遍用來代稱祖國的過程中通過與傳統孝親意識相結合，為現代中國人民族主義的強化提供了新的理性資源和情感動力。「她」字作為關鍵詞，蘊涵了中國現代性問題和跨文化交涉的印記，而成為「多種文化因素之間及其與社會之間彼此關係形態的文化史研究之新的物件」。³⁹ 「她」字的文化史研究，融合語言、文學、性別、觀念和跨文化交流的多維視野，逼顯出一個關鍵詞，涉及了觀念域文化交涉中關於語言變革、性別意識、文學再現、觀念轉型、社會變遷、文化行動等互動鏈，一個關鍵詞形成與演變的生命史，實質是一部文化變遷史。

則知，研究近代中國觀念的轉型，宜置於一種概念史的比較視野中，整體察考在中國／東亞／全球的文化框架中，近代中國轉型期相關知識／概念之譯介與跨文化流動，以勾勒出

36 參黃興濤：〈新名詞的政治文化史——康有為與日本新名詞關係之研究〉，《新史學（第3卷）·文化史研究的再出發》（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1版）一文。

37 康有為：「人限於其俗，俗趨於變，天地江河，無日不變。……散文、篆法之解散，駢文隸體之成家，皆同時會，可以觀世變矣」。又云：「蓋天下世變既成，人心趨變，以變為主，則變者必勝，不變者必敗，而書亦其一端也。夫理無大小，因微知著，一線之點有限，而線之所引，億、兆、京、陔而無窮，豈不然哉！故有宋之世，蘇、米大變唐風，專主意態，此開新黨也。端明篤守唐法，此守舊黨也。而蘇、米盛而蔡亡，此亦開新勝守舊之證也」。康有為：《廣藝舟雙楫·體變第四》、《廣藝舟雙楫·卑唐第十二》，分見華正書局編輯部：《歷代書法論文選》，頁 722-23、758。

38 康有為：《廣藝舟雙楫·十六宗第十六》，見華正書局編輯部：《歷代書法論文選》，頁 770。

39 參黃興濤：《「她」字的文化史：女性新代詞的發明與認同研究》（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版）一書。

中國在東亞／全球語境中概念引進和傳佈的路徑與移植和闡釋的方式與方向，以確認不同歷史經驗在時間軸線中的先後關係及共時性事件在不同空間跨語際流動中與歷史性結構之間的文化地理學上的關聯性，則在中國／東亞／全球的研究視域下，考察中國自我與他者觀念域的文化交涉，或能較整全而深入的勾勒出中國現代觀念演變的歷史圖像。誠如溝口雄三所言，中國的近代不可否認地是以中國固有的傳統為基體⁴⁰，不應該將中國近代僅看作是「西方衝擊」的承受者；「中體」的「西體」化，只是「舊中國」的蛻化過程⁴¹。討論中國的近代化，始終仍應置於中國／東亞／全球的文化交涉的歷史框架中，辨明他者如何深嵌於中國文化母體的自我意識中，致使蛻變再生。因而，探究東亞／全球視野中的中國現代觀念的轉型，不僅需要一種「比較概念史」⁴²的新視野，同時也須整體而深入地掌握中國的文化母體或歷史基體。

五、知識微縮革命與觀念史研究——數位人文學的轉向

觀念在歷史語境中的社會生成意義與脈絡化轉向，透過跨文化、跨語際交涉與互動的過程中，往往呈顯為高度嫁接、融滲、駁斥、裂變等極為錯綜複雜的多維度的動態結構。由於觀念凝塑為意識形態化價值信仰的社會化過程，通常是以相應於觀念的關鍵詞表達，因而採用關鍵詞語境分析，當是掌握在一定時空框架中不同歷史經驗下觀念的文化層積、流變狀態與脈絡化轉向較為有效的方法之一。但要穿越瞬息流變的語言叢林，抉取相應於觀念的關鍵詞與關鍵詞叢，以勾勒觀念演變的歷史圖像，洵非易事。隨著數位時代知識微縮革命的推進，以往學者以少數的物件與文獻，集中探討某一人物、某一著作或某一流派的研究模式，因著文獻數位化及數位人文學的興起而產生根本性的改變。面對文獻數位化的新命題與數位微縮的新技術，及研究型數據庫的開發與建置與「數據挖掘」、「關鍵詞叢」等數位方法的揭示，不啻也開啟了數位思維結合人文研究的觀念史研究新方法與新視野⁴³。透過數位工程技術協助人文研究的新方法，進行觀念與事件、行動之互動研究，不僅呈示出數位與人文合作的可能性與前瞻性，也開啟了數位人文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的方法新思維與研究新進路。

一般而言，觀念的變遷，是構成文化事件與社會行動展開的重要環節；觀念的不斷流變，也是在文化事件與社會行動衝擊下一次又一次演變而成。因而，金觀濤、劉青峰認為，觀念史研究並不能只停留在歷史事件如何制約關鍵詞意義變遷的微觀分析上，還應該將一個個關鍵詞意義分析拼合起來以得到歷史的宏觀圖象，並總結出社會行動是如何反作用於支配其發生觀念的一般法則。而此須憑藉著研究型數據庫的開發與建置，方能有效解決研究困境。因

40 溝口雄三所謂「歷史基體」論，即「中國有中國獨自的歷史現實和歷史展開，這體現於長期持續的種種現象在不同時代裡的緩慢變化上，所以中國的近代應該從近代與前近代的關聯來把握」。見溝口雄三著，孫軍悅譯：《作為方法的中國》（北京：三聯書店，2011年第1版），頁111。

41 溝口雄三著，孫軍悅譯：《作為方法的中國》（北京：三聯書店，2011年第1版），頁18-19。

42 參方維規：〈「鞍型期」與概念史——兼論東亞轉型期概念研究〉，《東亞觀念史集刊》第1期（2011年12月），頁104-12。

43 參鄭文惠：《東亞觀念史集刊》第1期（2011年12月），〈發刊詞〉，頁XIV-XV。

而，兩人自 1997 年起，建立了「中國近現代思想史研究專業數據庫（1830-1930）」⁴⁴，並對諸如「科學」、「民主」、「權利」、「社會」、「革命」、「個人」等最重要的十組現代觀念及與此相關的近一百個政治術語進行歷史語義之分析⁴⁵，進而發現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觀念的形成大都經歷了選擇性吸收、學習、創造性重構三個階段⁴⁶。由於著重於「觀念史圖像中的事件」與「觀念」間的互動⁴⁷，因而，兩人透過不斷的研究，分別揭示「數據挖掘」之數據庫方法與數位人文學⁴⁸，注重觀念轉化為社會行動、社會行動又如何改變（反作用力）觀念的互動鏈，以作為觀念史數位人文研究的理論模型與方法建構。

所謂「數據挖掘」是電腦處理數據的新方法，它有助於研究者思考如何從數據庫中提取數據，並通過分析發現研究對象之間易被忽略的關係。透過此一方法可以從專業數據庫中分析某一觀念相對應的一個或一組關鍵詞及其年代分佈頻度，並通過解讀文本來分析該關鍵詞的不同意義類型及演化過程，進而挖掘和尋找出一般人工很難完成的名目繁多的事項間的相關性分析，從而開啓新思路，發現觀念演變軌跡，勾勒出新觀念的發生和演變與社會事件互動的進程⁴⁹。數據庫方法是以表達某一觀念的關鍵詞例句為中心，以揭示觀念與社會行動之間的相互作用，特別是社會行動如何反作用於觀念；尤其是當關鍵詞研究範圍從對應著概念的關鍵詞，擴大到包括事件、對象、社會行動、行動主體和以及各類事物的關鍵詞時，對關鍵詞的分析就會擴大到以歷史為中心的整個人文科學；而隨著數據庫方法在各類關鍵詞研究的應用，也將推動數位人文學的興起⁵⁰。

金觀濤、劉青峰從 2009 年起在臺灣國立政治大學帶領「中國現代認同的形成與演變」研究群，進行觀念史數位人文研究，其中有以動詞「改造」作為關鍵詞研究對象。「改造」一詞，乃涉及了行動主體與改造對象，透過「改造」一詞在中國近現代的歷史語義學考掘，是一個從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道德的變化過程，由之也證實了中國現代化的改革目標，以及背後的預設觀念是先改造自己，進而改造社會結構⁵¹；改造主體前後不同，改造序列也

44 「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原係香港中文大學劉青峰主編，自 2010 年起由臺灣國立政治大學「中國近現代思想及文學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計畫主持人暨主編鄭文惠與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共同合作開發。有關數據庫文獻目錄及說明，參見金觀濤、劉青峰：《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 年），附錄一〈「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文獻目錄〉。

45 參金觀濤、劉青峰：《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 年），附錄二〈百個現代政治術語詞意彙編〉。

46 參金觀濤、劉青峰：《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 年），頁 6-21。

47 參金觀濤、劉青峰：〈歷史研究的客觀性：論觀念史圖像中的真實〉，《新史學》，第 18 卷第 1 期（2007 年 3 月），頁 87-119。

48 參金觀濤：〈數位人文研究的理論基礎〉，收入項潔編：《數位人文研究的新視野：基礎與想像》（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1 年），頁 45-62。

49 參見金觀濤、劉青峰：《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 年），頁 5-6。

50 參金觀濤、劉青峰：〈隱藏在關鍵詞中的歷史世界〉，《東亞觀念史集刊》第 1 期（2011 年 12 月），頁 53-75-81。

51 參姚育松：〈從「改造」一詞的使用看共產主義在中國的發生背景〉一文，收入項潔編：《數位人文在歷史學研究的應用》（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1 年）。

有先後。

或觀察「主義」一詞的產生、發展與變化的過程，勾勒其發展趨勢與彼此之關係，及其在近代中國產生的影響。研究者「中國近現代思想史研究專業數據庫（1830-1930）」中共抽取五萬一千多筆「主義」例句，在數位工程師協助下，設定統計程式，以分析「主義種類」的總數量、每年使用的「主義種類」的數量、各種主義在每年的使用頻度，確定了1830-1930百年間中國出現近1680種不同的主義，並給出每年「主義」種類數目，統計表明哪些主義最多使用，並分析1903年使用次數最多的「民族主義」、「帝國主義」及「社會主義」之間的關係，以及其作為取代傳統儒家意識形態的新的意識形態之意義，為「主義」這一重要關鍵詞研究提供了宏觀的面貌。⁵²

或以據數據庫中的《清季外交史料》為研究範圍，分析「中國」「主權」觀念所涉及的關鍵詞類型時，由於著重於語境對確定關鍵詞意義的重要性，進而提揭出與關鍵詞共生的「關鍵詞叢」數位方法。⁵³所謂「關鍵詞叢」數位方法，首先須萃取所研究之「觀念」的「關鍵詞叢」與「前觀念詞叢」，並建立「關鍵詞庫」，再藉由數位輔助研究，以進行「關鍵詞叢」間的交互重組及「共生詞頻」的分析，進而探討觀念的類型結構及觀念的嫁接、重組與對話，觀察觀念的起源、流變及與其他觀念互動的動態發展，以勾勒觀念演變的歷史圖像。由於「關鍵詞叢」具「觀念聚合性」與「詞彙共生性」的特徵，因而，採用關鍵詞叢分析方式，透過「共生詞彙」對關鍵詞進行定義，以分析「觀念重層性」建構的模態，觀察觀念的起源以及與其他觀念的互動變化，當能有效的勾繪出觀念的動態發展。⁵⁴

52 〈「主義」的數位人文研究〉一文所使用的數位程式：1. 定位及縮小要處理的文字範圍（reduce and locate the target-area size）。2. 利用後序遞增法產生候選清單，並進行人機互動比對在合併相同詞彙過程中，將四個字元的「主義」數量從五萬一千多筆減少至三千八百多筆，減少92%的數量。然而這種依照字數遞增的逐字切割方法無法保證取得有意義的「主義」，因此還需要佐以加總及統計方法，在確定為有意義詞彙的過程中，將出現次數在十次以上的四個字元的「主義」數量從三千八百多筆減少至三百八十多筆，減少90%的數量。在這兩個步驟過程後，共減少了99%的數量。此外，再進一步藉由統計的數字歸納出更多有意義的「主義」詞組（patterns）。3. 重複利用清單提取更多潛在的詞組（pattern）。4. 統計和一些實用的技巧（statistics and some useful skills）。透過上述的程式後，便能取得「主義種類」的總數量。最後進行統計與分析，將透過以上程式所獲得的數據，依年代分佈進行排序，以求得統計每年使用的「主義種類」的數量及各種主義在每年的使用頻度。在此一階段，則透過程式統計文獻資料，以獲得研究所需之數據。因此，數位科技的引入，提供研究者統計大量且複雜的文獻，與數據之方法與結果，有助於研究者之分析與解釋。參見詹筌亦、王乃昕：〈「主義」的數位人文研究〉，收入項潔編：《數位人文在歷史學研究的應用》（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1年），頁219-45。

53 該文先仿科學實驗的抽樣小試，設計程式對所有提及「中國」之內容，進行觀念類型提取並統計結果：形成一個特定樣本後檢驗並調整在小範圍史料分析的有效性；再以所歸納出的近現代「中國」認同下「主權」觀念類型發展趨勢圖，去與當前相關研究成果對話，為研究者提供一個宏觀的參考。參邱偉雲：〈關鍵詞叢與文本意義挖掘的嚐試：以《清季外交史料》為例〉一文，收入項潔編：《數位人文在歷史學研究的應用》（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1年）。

54 「關鍵詞叢」概念，是以研究者所關注之「觀念」出發，尋找表達該「觀念」時共生頻率高的相關詞彙，如以「主權」觀念為例，其共生頻率高的詞彙有「和約」、「自主之權」、「權力」……等。而以「主權」觀念為主軸，旁及諸多「共生詞彙」之一套語匯結構，即可稱之為「主權」的「關鍵詞叢」。關鍵詞叢數位研究法之程式：1. 選取主要關鍵詞例句；2. 建立研究範疇關鍵詞庫；3. 進行關鍵詞庫定義程式；4. 運算觀念類型分佈表；5. 分析觀念類型趨勢圖。一個觀念應是由更多關鍵詞所共同建構出來的，因此要能掌握觀念的真正歷史發展，必然得使用關鍵詞叢之方法來進行歷史發展脈絡的描繪。換言之，以往

或以「華人」觀念起源為例，對《清季外交史料》關於華工的相關史料，進行「共現」詞頻之分析，分析詞彙的語境與共現的現象。文中先透過《清季外交史料》(1875-1911)中對「華工」議題的歷時性描述，形構出當時官方對於「華工事件」的認知轉移過程；再從「華工事件」中諸多「關鍵詞」內涵的歷時性變化中，進一步觀察「華人」觀念是如何隨著「華工」事件認知焦點的轉移而逐漸形成之脈絡。文中得出結論：其一是，「華人」觀念起源於「華工」事件；其二是，華工事件引起中國對於華商的重視，而清廷對於華商觀念的改變，也促成了華人意識的興起；其三是，美國的「排華」從限禁「華工」擴大到整個「華人」；其四是，華工事件引發清廷保護海外華人的心態，而呈現出從保護「華工」到保護「華人」的行動過程。⁵⁵

或以「平等」作為關鍵詞，進行「準詞彙抽取」⁵⁶，之後經由研究者從準詞彙中篩選出有意義的詞彙。接著，對關鍵詞叢進行分群，然後對分群後的關鍵詞進行檢視，並以文獻佐證，以勾勒出不同階段間「平等」與相關聯觀念的互動過程。文中透過數位擷詞技術與觀念史研究之結合，得出近代平等觀念的發展脈絡為：在戊戌思潮階段，平等價值追求有兩個方向，其一是追求中國與西方強權於國際上之平等地位，其二是瓦解儒家公私領域之三綱觀念；在學習階段中，由於1900年庚子事變後，中西公私領域產生二元二分變化之故，因此主要呈現為對公領域政治平等價值之追求；在重構階段中，則可觀察出，有從1915年開始之個人平等價值追求，到1919年後階級意識產生下，平等成為一工具與手段，而不被視為是一種價值的發展過程，因此在1924年之後，平等成為不同階級意識下的口號。此文透過PAT-tree 數位擷詞技術，證明了王汎森認為措辭與概念數量的升降可以反應一個時代心理特質的主張；⁵⁷在相當的程度上，也展示了如何利用關鍵詞叢，快速掌握多篇文件中觀念的變遷，以及各時期觀念的主要內涵。文中試圖通過觀念史數位人文研究，構築出成近現代中國平等觀念內涵的敘事結構，研究結果也驗證了前人對近代中國平等觀念發展脈絡的看法，⁵⁸則數

是以單一關鍵詞來代表觀念，如今透過數位方法之協助，則可更進一步以「關鍵詞叢」來指涉一個觀念。參邱偉雲：〈關鍵字叢與文本意義挖掘的嘗試：以《清季外交史料》為例〉，收入項潔編：《數位人文在歷史學研究的應用》(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1年)，頁159-88。

- 55 《清季外交史料》中有關「華工」關鍵詞之文獻共有109篇，總字數為118,899字，文中主要以PAT-tree 數位擷詞技術與共現詞頻分析法為數位輔助程式，透過數位程式，可協助研究者快速在所欲研究的龐大文本中，切割出眾多的待選詞，再由研究者確定重要關鍵詞後，進一步將關鍵詞兩兩配對成共現詞組，觀察各共現詞組的共現頻度及歷時性分佈。參金觀濤、邱偉雲、劉昭麟：〈「共現」詞頻分析及其運用——以「華人」觀念起源為例〉，國立臺灣大學數位典藏研究發展中心、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主辦：「第三屆數位典藏與數位人文國際研討會」(2011年12月1-2日)會議論文集。
- 56 本文主要使用計算機軟體技術中的PAT-tree (Chien 1999) 來記錄與分析文獻中任意字串的頻率，相關論述參見Lee-Feng Chien. "PAT-tree-based Adaptive Keyphrase Extraction for Intelligent Chinese Information Retriev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Management* 35(4), 1999, pp. 501-21; 劉昭麟、金觀濤、劉青峰、邱偉雲、姚育松：〈自然語言處理技術于中文史學文獻分析之初步應用〉，國立臺灣大學數位典藏研究發展中心、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主辦：「第三屆數位典藏與數位人文國際研討會」(2011年12月1-2日)會議論文集。
- 57 王汎森：〈從新民到新人——近代思想中的「自我」與「政治」〉，收入許紀霖、宋宏編：《現代中國思想的核心觀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頁242。
- 58 邱偉雲、金觀濤、劉青峰、劉昭麟：〈近代中國觀念轉型過程之數位考察：以戊戌思潮、學習階段與重構階段平等觀念為考察對象〉，國立臺灣大學數位典藏研究發展中心、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主辦：「第四

位人文方法與史學、思想研究可兩相輔證，使研究具可檢驗性與可開放性。

或以《新青年》為例，運用齊夫定律⁵⁹偏離值計算來找出文本的關鍵詞。統計偏離值分析於人文研究上的應用，研究特點是將關鍵詞的概念加以量化，並從統計理論出發得出一個較客觀的指標。實驗結果發現，利用 PAT-tree 數位擷詞技術及根據 Zipf-Mandelbrot 模型計算出的理論曲線，能夠統計出「準詞彙」的偏離值，從而得知最大偏離段及確定關鍵詞，由此除了解決主觀判斷的爭議及減少人工篩選的負擔外，也具有三項突破。一、能更加準確地將關鍵詞篩選出來，從而更加細緻地觀察思想變化，以及反映在文本上的語言現象；二、應證了偏離值大小能夠代表詞的關鍵性，從而揭示出《新青年》的思想變化，從無共識觀念，到思想討論，最後到意識形態確立的過程；三應證了關鍵詞詞數能夠部份反映文本的思想變化。由於觀念濃縮於關鍵詞，關鍵詞的多寡能夠反映明顯觀念的多寡。如第一卷關鍵詞為「國家」、「政府」，第二卷為「青年」，由之可掌握歐戰之後國家主義瓦解，「青年」觀念提升為關鍵詞的現象；然而，當時是社會主義尚未引入起得反響的時期，第一卷到第五卷出現的關鍵詞，自然偏離值偏低，這時期的關鍵詞偏少，未有核心價值表達的觀念，故可定此時期為「無共識觀念期」；第六卷到第八卷，即 1919 年到 1921 年間，是社會主義引入取得反響的時期，具有最大偏離值的關鍵詞，分別是「社會」、「他們」、「我們」。此外，還有大量的屬於無產階級革命意識型態的關鍵詞，如「勞動」、「工人」、「資本」，則知這時期《新青年》的作者們仍未一致地共同使用相同意識型態的概念語言，但這時期的關鍵詞偏多，明顯的觀念變多，可稱為「思想討論期」。第九卷到第十一卷時期為中國共產黨成立後，標示著意識型態的確立，最大偏離值的關鍵詞分別是「主義」、「階級」、「主義」等意識型態用語，正好應證了具體的、共識觀念的確立，這時期可稱為「意識型態確立期」⁶⁰。或以《清末籌備立憲檔案》為文本分析對象，借用齊夫定律進行社會行動的數位人文研究，發現到清政府在推動行政和司法機構改革的成效是大於立法機構的⁶¹。由此可知，統計偏離值分析，可確立關鍵

屆數位典藏與數位人文國際研討會」，2012 年 11 月 29-30 日，頁 329-73。

- 59 應用齊夫定律來確定關鍵詞的假定如下：齊夫定律作為一經驗法則，發現普遍上文本的詞頻 (frequency) 之取對數 (log) 之後，便會有一特定的分佈，因此能夠在知道某文本的字數之前提下，在還未實際統計該文本的詞頻前，便能預設該文本應有的理論曲線，即為其按照齊夫定律應有的分佈。想當然的是，實際分佈曲線與理論曲線必定是有差異的，而此差異即表現在某些樣本，也就是某些詞之詞頻偏離了理論曲線，這通常表現在某詞之詞頻被異常地大量或少量使用。我們將那些詞頻遠遠超出其他詞彙使用量的詞彙，假定為該文本的「關鍵詞」。可以發現到，詞頻異常高的樣本群，其實際曲線與理論曲線通常呈現出一明顯的偏離段，由此我們便假定這些樣本群即為「關鍵詞詞叢」。參金觀濤，梁穎誼，姚育松，劉昭麟：〈統計偏離值分析於人文研究上的應用——以《新青年》為例〉，國立臺灣大學數位典藏研究發展中心、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主辦：「第四屆數位典藏與數位人文國際研討會」（2012 年 11 月 29-30 日），頁 287-308。
- 60 參金觀濤、梁穎誼、姚育松、劉昭麟：〈統計偏離值分析於人文研究上的應用——以《新青年》為例〉，國立臺灣大學數位典藏研究發展中心、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主辦：「第四屆數位典藏與數位人文國際研討會」（2012 年 11 月 29-30 日），頁 287-308。
- 61 參金觀濤、姚育松、劉昭麟：〈社會行動的數位研究——以清末預備立憲為例〉，國立臺灣大學數位典藏研究發展中心、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主辦：「第三屆數位典藏與數位人文國際研討會」（2011 年 12 月 1-2 日）會議論文集。

詞與觀念變遷的關係；或論析自然語言處理技術于中文史學文獻分析之應用⁶²；或探索漢文文獻之外來語音譯詞擷取方法等⁶³。

觀念史研究是一種方法、一種視角。以觀念史為核心的跨領域的文化考掘學，由以 Lovejoy 為核心的觀念史研究到英國劍橋學派 Skinner 與 Pocock 的觀念史研究，與德國 Koselleck 的概念史研究遙相呼應外，隨著當代數位微縮時代的推進，更開啟了觀念史數位人文研究的新視野與新趨勢。為打破目前學科分科專業化傾向所造成知識的隔閡、割裂狀態，則致力於跨文類、跨學科、跨領域的觀念史研究，當是重啟越界研究對話與交流的可能方案；透過觀念史的文化考掘學，當能較有效的考掘出觀念在共屬於思想體系的有機體中多音複雜調的重層性與文化越界的流動性。然而，概念／觀念在跨語際實踐過程中，透過不同媒介的文化翻譯與隱喻工程，跨越了語言與文化的邊界，一一轉為智性工具與思想資源，使文化母體面對他者可以不斷地重組和轉化自我的同時，要察考中國現代觀念在東亞／全球歷史語境中的社會生成意義與脈絡化轉向，而這實非研究某一人物、某一論著、某一家派、某一領域，即可揭示概念的引進、傳佈與觀念的形塑、變遷的總體樣態。但，因應著知識微縮革命時代的來臨，研究型數據庫的開發與觀念史數位人文研究不啻提供了觀念史研究轉向及突破的一個新的契機。以人文學者專業為主體，透過研究型數據庫的建置與數位運算技術的開發，從提供高信度與高效度的統計分析數據到在大量數位文獻中追蹤、考掘關鍵詞與關鍵詞叢的出現、使用與共現頻度和意義變化等，以判定相應於新觀念的出現、變化和定型的軌跡，以揭示新思想意識形態的形成，當能更具效力的揭示出觀念形成、變遷和社會重大事件的關係，客觀而整地掌握觀念轉化為社會行動、社會行動又改變觀念的互動鏈，而得以勾勒出「觀念史圖像中的事件」與「觀念」間互動的大歷史結構。

尤其觀念史研究本身是一門跨文類、跨學科、跨領域的文化考掘學及注重語境、事件、行動的研究取向。為了拓展、深化相關議題，勢必須整合不同領域，進行跨時段、跨地域、跨文化的長期協力研究。因應著數位時代知識微縮革命的推進，面對各式各類的學術資料庫與大量的數位文獻，以數位文本為研究的文獻類型，在「人文研究思維」結合「數位推論技術」下所形成的「數位思維邏輯」，無疑開啟一種新的研究範式。一方面，大量的數位文獻的搜尋與彙整分類，在在挑戰著研究者的文獻篩選與閱讀及組織、分析、詮釋能力；研究者面對繁富蕪雜的龐大資料時，除不斷拓展學術視野、深化研究方法與厚實詮釋能力外，尤須善用人文專業的素養與訓練，立基於學科主體性以人文研究為主軸，勇於向數位科技提出創新性的研究需求，協助數位技術人才開發符合研究議題的具高信度與高效度的統計分析數位技術，以有效處理龐大的文獻資料，並得以發現問題諸多不同而可能的面向，除解決傳統研究上人力所不及之處，進一步也突破了傳統人文研究的困限；一方面，結合「人文研究思

62 參劉昭麟、金觀濤、劉青峰、邱偉雲、姚育松：〈自然語言處理技術于中文史學文獻分析之初步應用〉，國立臺灣大學數位典藏研究發展中心、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主辦：「第三屆數位典藏與數位人文國際研討會」（2011年12月1-2日）會議論文集。

63 參王昱鈞、呂翊瑄、蔡宗翰、劉青峰、金觀濤、劉昭麟：〈漢文文獻之外來語音譯詞擷取方法〉，第四屆數位典藏與數位人文國際研討會，國立臺灣大學數位典藏研究發展中心，2012年11月29-30日，頁247-63。

維」與「數位推論技術」的「數位人文學」，是以一種「協作思維」進行「跨領域研究」，尤更能促進研究團隊跨領域的協力合作，這更是不同於傳統個體研究的模式。⁶⁴為了有效揭示觀念形成、變遷和社會重大事件的關係，以勾勒出事件、行動與觀念間互動的大歷史結構，在以人文研究為主體並結合數位運算技術的觀念史數位人文研究方法，或許是為觀念史研究由歷史語義學朝向數位人文學發展提供了一種新的可能性。「人文研究思維」與「數位思維邏輯」結合的觀念史數位人文研究作為一種新方法與新視野，迥不同於傳統研究方法與學術進路，或有可能促成傳統思想史研究範式的移位。當然，觀念史數位人文研究，只是一種新的嘗試與探索，未來還有一條漫長而艱辛的路要克服與超越。但隨著人文學者在跨領域研究的不斷精進及學科整合的有效交流與對話，以及研究型數據庫的不斷擴大建置與完善、數位運算技術更切合人文研究，則藉由「人文研究思維」結合「數位推論技術」的觀念史數位人文研究，或乃提供了一種勾勒「觀念史圖像中的事件」與「觀念」間互動的大歷史結構的新的學術視域與研究圖式。

64 參鄭文惠：〈數位時漢學研究的衝擊與蛻變（討論）〉，漢學研究中心、國科會人文及社會科學發展處合辦：「臺灣漢學新世紀——漢學研究中心三十周年學術論壇」（2011年10月14日），《臺灣漢學新世紀——漢學研究中心三十周年學術論壇論文》，頁55。